



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论特征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既有温度，也有力度。所谓“温度”是就马克思的价值立场和治学态度而言，所谓“力度”是就问题本身的性质和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结论而言。马克思之所以被评为“千年十大思想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相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这“两大规律”，从而为人们科学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南。

□ 焦佩锋

在人类创作的众多精神产品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堪称经典，这些经典是后来者安顿生存、实现发展的宝贵资源。经典之所以经典，大致有三个标准。

一是它的问题很经典。经典著作往往分析的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关乎人性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历史的本质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等“老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分国界、民族和性别，我们研读经典，其实就是想探究前人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要观点，以求对自己的安身立命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是它的问题很经典。经典往往是立体的。凡是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东西一定包含着丰富的分析方法，这些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成就作品本身的同时也为人们织就了一幅立体的图画，它为我们多维度地透视事情本身提供了经典的方法论参照。

三是它的结论很经典。经典著作往往包含着经典结论，这些结论往往具有总结性、典范性和标志性意义，它代表了前人对某一问题的集成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又成了后人进行相关研究时“绕不过”的前提。正是在对这些前提的探索和积累中，人类知识的数量和水准才会得到增加和提升。

很显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他的许多著作既有温度，也有力度。所谓“温度”是就马克思的价值立场和治学态度而言，所谓“力度”是就问题本身的性质和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结

论而言。马克思之所以被英国广播公司评为“千年十大思想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相继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这“两大规律”，从而为人们科学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究竟对什么问题不满？或者说，他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我们理解，马克思主要对两个层面的问题不满。一个是他对哲学层面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满，这种哲学往往从外部规定事物，从而使

人无法准确把握自然、历史和人的本质。正是因此，对唯心主义及其形而上学样式的批判纵贯马克思的一生，因为“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要比“从头脑中想出联系”难得多，这便是“实事求是难”的认识论根源。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对现实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满。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处境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最大讽刺，当然，马克思没有进行单纯的道德控诉，而是将精力转移到了对劳资矛盾的深入分析之中。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人类需要资本，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是，人类必须学会分析、批判和驾驭资本，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破坏性是导致社会不公和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史的真正开始。

上述两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著名的“两大发现”。马克思首先发现了

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每天首先需要满足吃、喝、住、用、行以及为此而必须展开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这个“物的事实”是全部社会问题的基础和根源。只有聚焦于这个事实，我们才能懂得“生产力标准”对于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意义。此外，“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剩余价值规律。依据这个规律，我们不仅看到了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而且看到了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拿走并转而通过制度的方式巩固这种经济剥削的各种努力。

梳理可见，马克思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一般条件下人类生存的基本秘密，一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生存的基本秘密。前一个问题具有一般性，后一个问题具有特殊性。要获知前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树立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成果。要获知后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聚焦“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时代现实，以及附着其上的现代人的生存焦虑、精神迷失和道德无助感。在这两重意义上，如果再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我们读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领会新唯物主义

思维方法，进而为辩证的思考和处理现实问题奠定科学的思维基础。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的逻辑运动，进而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提供学理依据，这为我们走出资本时代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

经典著作不仅包含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包含着经典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既体现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人类智慧的深刻性。当然，必须看到，这种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其实十分艰难。纵观人类思想史，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十分稀少，所以，向经典致敬天然包含着向经典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方法致敬，这是提升逻辑思维能力，推动社会平稳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们不妨以《资本论》为例做些说明。《资本论》不仅包含着问题，也包含着方法。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是一种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也是一种方法，前者是历史的方法，后者是逻辑的方法，只有把这两者相结合，我们才能科学地把握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所以，就像“人体解剖

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对于资本，我们既要追溯其简单形式，也要研究其复杂形式；既要追溯其一般过程，也要研究其内在结构。马克思分析到，“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的确，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抛开人口所构成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又如，对于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所以，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本，我们更要注重其质的丰富性。即便是在古代奴隶社会也有商品经济形式，但是，这种商品经济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到繁盛时期的产物，而且这种经济形式并未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所以，商品经济必然从属于一个新的更高的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尽管它在之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获得了某种发展。

马克思的基本结论

马克思大半生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事实，或者说，经济事实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进行理论清算和问题总结的关键基础。基于这一基础，他给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赋予了新的结论：

在哲学上，马克思的结论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其主要成果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马克思坦陈，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就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必须从这个动力机制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出发去研究社会发展的方位、社会运行的特点、社会矛盾的状况和社会治理的办法，这个原理对于分析人类历史的一般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都适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在经济学上，马克思的结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其成果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它杜绝了对资本主义乃至于对全部人类历史的主观想象。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实质是维护经济私有及其政治剥削，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这一机制通过被资本驱使的剩余劳动得到展开和完成。正是因此，马克思透过商品的两重性看到了劳动的两重性，尤其是剩余劳动的发现使马克思所困惑的“物质利益的难题”找到了最终答案。欧洲工人运动失败之后，马克思之所以回到大英博物馆专心研究经济学，就是因为他发现单纯地进行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诉诸经济解放或者说将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获得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效用。

综上，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哲学依据

□ 张西立

大有 笔潭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 李辉卫

话语出处：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学习札记：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理论，科学阐明了新形势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和重要途径。

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是治国理政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不可偏废。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自觉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可以践行惩戒。只有建立在坚固道德基

石上的法治，才真正坚如磐石、牢不可摧，才有深厚的正当性和道义基础，才能赢得民众内心的服从和拥护。也只有坚强和可靠的法治保障，道德的教化、引导、约束、调节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再美好的道德也将不堪一击。因此，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德治和法治的思想和实践贯穿历朝历代，德法合治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治国应当“大德而小刑”。到了唐朝，当政者一方面通过“贞观修礼”推行德治，一方面制定严密的《唐律》推行法治。正是因为礼法并举、德法合治，才出现了汉唐时期的盛世。相反，单纯依靠德治的周期，最终因礼崩乐坏而天下大乱；单纯依靠法治的秦朝，最终因暴政导致二世而亡。历史证明，只有德法并重、德法合治，国家才能治理好。而单靠德治或单靠法治，都难以把国家治理好。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唯有“法”才能安天下。法是什么？说到底，法就是规则、是限制、是契约、是公正。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法令行则国家治，法令弛则国家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

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可以说，没有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野蛮就失去缰绳，文明将无处依托，天下就会出现大乱。现在，我们党是在一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要保证国家统一、政令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唯有“德”才能润人心。如果说法律就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身体，那么道德却能直入人心、直抵灵魂深处。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历来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通过道德感化人、教育人，进行心理改造，使人之心向上向善，知耻耻辱而无奸邪之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道德不倡，天下不宁。”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和努力形成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增加正能量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使整个社会正气充盈、人心大顺、和谐安定。

学习札记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说过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前，全党上下矢志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深刻同时也是更为艰巨复杂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本和灵魂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那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提出自我革命，或者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哲学依据何在呢？

来自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尽管人类早期思想家提出过形形色色的关于宇宙本源的学说，但是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不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都是不彻底的哲学观点。牛顿力学、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发现了客观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规律，加之近代机器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由此催生了建立在科学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揭示了人类赖以存在的“自在自然”的物质本性及其矛盾动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等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认识。在以往数千年历史上，对于世界和宇宙本源的解释权、话语权，仅掌握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统治者手中，他们不会也不能做到“老实”“真诚”和“科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为共产党人在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进程中实现“大我”境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来自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在唯物史观那里，它既不是“上帝”和“神”创造的，也不是帝王将相或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归根结底是处于社会大多数的亿万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谋私利的无私无畏的胸襟和气度，更是揭示了共产党人秉持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史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切以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为检验准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最为直接而生动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历史担当和永恒使命。有了这

样彻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引，当下乃至未来改革发展进程中不论出现何等艰巨复杂的困难和问题，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共产党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不能解决的。这种“舍我其谁”的态度，放眼当今世界，可以说，惟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拥有。

来自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彰显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运行过程中改革问题的认识愈益清醒和深刻，在政治胆略、战略定位、改革举措以及策略选择上愈加坚定而从容。对于秉持彻底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发扬“两个务必”的精神，勇于面对自身建设的严峻现实，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不断推进“自我革命”。30多年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如今，面对西方金融危机愈演愈深，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国内各种矛盾相互叠加，新发展理念亟待全面贯彻，而改革，依然是决定性的一招。除了将改革进行到底，后退、犹豫、彷徨，都将是死路一条。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过去的“维新”与“改良”，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内在活力与人民自身解放的崇高事业，其方向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与此同时，改革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特别是涉及一些既得利益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既要勇字当头、不避风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又要遵循事物变革的内在机理，把战略定力与循序渐进、顶层设计性与基层创造、中央决策部署与地方积极性、重点突破与全局协调、改革试点与整体推进等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全方位、各领域改革的协同推进，共同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宏伟目标。